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语际交流中的  
社会语言学

[美] 尤金 A·奈达 著  
严久生 译  
陈健康 校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汉英双语版

语 际 交 流 中 的  
社 会 语 言 学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美〕 尤金 A·奈达 著  
    严久生 译  
    陈健康 校译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1999 年

# 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

〔美〕尤金 A·奈达 著

陈健康 校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32 印张：7.25 插页： 页数：177 千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1015-974-7/H·78

定价：18.00 元



本书作者尤金 A·奈达教授与本书校译者陈健康教授

参加本书翻译和译文讨论的研究生有：

胡小平、陈 霞、张金正、吕拾元、宋 敏、温 军、张 惠、刘勇男；  
李德娟、云丽娜、张秀英、张庆华、赵劲鹰、吴泽庆、段满福。

译者“严久生”系“研究生”的谐音。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was done and discussed by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The translator's name "Yan Jiu-sheng" is the homophonic combinatio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ese.

## 内蒙古版序言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凡是讨论语际交流问题的著作都必须使用专业性的术语和复杂的语法结构来撰写。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作者真正谙熟某一学科，如语言学或文化人类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基本概念总是可以用通俗的语言来进行阐释的。使用少量的专业词语也许非常有益，但这也常常可以用普通的词语来加以解释。因此，为了使基本概念一看就懂，并且能够把它们用来解决语际翻译中的实际问题，《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这本书是经过认真修订的。

语言和文化浑然一体，紧密相联。没有语言，文化便不可能发挥它的功能；没有语言，文化也不可能世代相传。而且，一种语言中词语的所指对象，都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则是社会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因此，要认识一种文化，就必须借助该

文化的语言；而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就必须考虑它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是一整套最重要的、有联系的符号。正是通过这套符号，文化才得以展示和表达它所蕴含的传统和价值观念。

在这个人们必须学会相互理解的世界里，正确认识语言所起的种种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它有助于我们相互理解，休戚相关地生活在这个操着一千多种语言的国际社会中。

尤金 A·奈达

1999年4月7日

## Introduction to the Inner Mongolian Edition

Many people wrongly assume that any book that deals with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languages must be written in technical terminology and with complex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But this is not true. If an author really understands the problems of any scientific discipline such as linguistics 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basic concepts can always be explained in everyday language. A few technical terms may be extremely useful, but these can always be explained by ordinary words. Accordingly,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revise the volume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 basic concepts can be readily grasped and applied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ransla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Both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intrinsically bound together.



A culture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language, nor can a culture be passed 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without language. Furthermore, the referents of all the words of a language are a part of the culture, defined as the totality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 culture, one must do so by means of its language, and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s of words, a person must look to the culture. Although language is a part of culture i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levant set of symbols by which a culture reveals and expresses its underlying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a world in which people must learn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nothing can be more crucial than a proper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s of languages in helping us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and to live relevantly in a world community speak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Eugene A • Nida**

**April 7 , 1 9 9 9**

# 目 录

内蒙古版序言 .....	( I )
<b>Introduction to the Inner Mongolian Edition</b> .....	( III )
序 .....	( 1 )
第一章 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	( 9 )
第二章 言语交流的语码与作用 .....	( 21 )
第三章 语言的个人使用 .....	( 31 )
第四章 社会中的语言 .....	( 43 )
第五章 语言契约 .....	( 53 )
第六章 词和习语的意义 .....	( 71 )
第七章 语法结构的意义 .....	( 80 )
第八章 翻译工作者的语言观 .....	( 93 )

## 序

翻译是具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自远古以来,人类就已经认识到相互进行交流的必要。一旦接触到外域人和外域文化,人类很自然地就要想方设法去进行语际交流,先是借助口译,后来才是笔译。

然而,尽管翻译实践早就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繁荣起来,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在构建翻译理论方面蹒跚起步。除多雷<sup>①</sup>(Dolet)在1540年发表的名篇做过审慎的尝试外,直到17世纪,由于法兰西学院和詹森主义<sup>②</sup>的共同影响,人们才进行认真探索,按照科学的方法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但这些努力在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末期被窒息了。1660年加斯帕尔·德·唐德<sup>③</sup>(Gaspard de Tende)发表的《翻译的标准》(*Règles de la traduction*,1660)和1661年皮埃尔·达尼埃尔·于埃<sup>④</sup>(Pierre-Daniel Huet)发表的《论翻译》(*De Interpretatione*,1661),首先放弃了继西塞罗<sup>⑤</sup>(Cicero)之后历代译家的传统做法。而西塞罗之后的历代译家,因为

迫于要在一种建造巴别通天塔<sup>®</sup>失败后的怀疑氛围中来捍卫翻译事业,只能是凭借经验来进行摸索。

在法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贯穿了整个18和19世纪,但从未达到唐德和于埃开创的高峰。这种思想枯竭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当时,由于受大学开设翻译研究课程的激励,人们才对翻译理论表现出新的兴趣。

像翻译这样复杂的人类活动,它既需要天赋又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把不同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但是,长期以来却未能建立起翻译理论基础,至少可以说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然而,科学理论不能仅停留在译家书斋中的一己之见当中。译家的个人经验固然可资借鉴,但毕竟只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映。

翻译是一种通过语言发挥语言功能的过程,所以它与其它许多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紧密相关。然而,语言学家却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穆南(*Mounin*)说得十分中肯:索绪尔(*de Saussure*)、耶斯佩森(*Jespersen*)、萨丕尔(*Sapir*)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提到翻译过程,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阐明其它语言现象。有意思的是,直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960—1961年版本出版时才增加关于“翻译”的一个词条,而迪德罗<sup>®</sup>(*Diderot*)和达兰贝尔<sup>®</sup>(*D'Alembert*)在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早已对翻译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收录了大量的参考文献。

语言哲学家也常常认识不到翻译研究所能提供信息的价值,即对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的真知灼见。

用卡里(Cary)的话来说,由于翻译受到相关学科学者们的冷落,从而使它没有能够被看作是一种 *sui generis*(自成一体的)活动。还有,正是因为翻译被认为是与其它学科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因而也就未能享有独立学科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杰出的翻译实践家——无论是圣哲罗姆(*Saint Jerome*)、路德(*Luther*)、达西埃(*Darcier*)夫人,或是更近代一些的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主要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似乎只有这类作品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或者是只有它们才拥有“市场”。然而研究表明,科技翻译(专业翻译)与文学翻译相得益彰,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说科技翻译先于文学翻译,但它至少具有与文学翻译同样久远的历史,尽管它不像文学翻译那样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最后,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可译性这个古老的问题——即翻译是否可能,是否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进行翻译。对翻译活动的悲观论调长期盛行,从而延缓了翻译理论的形成,并使许多人对翻译这一职业本身应有的地位产生了怀疑。然而,人类各个历史阶段都依赖于翻译,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代也许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是在这种颇为暗淡的背景下,人们才在 20 世纪 50 年代重新认识到翻译理论的必要性,于是学者们最终做出了 *salto mortale*(决定性的飞跃):将仍处于胚胎阶段的翻译理论应用于古老的翻译实践之中。这种对翻译理论重新表现出来的兴趣是由于兼收其他学科知识点燃的,并最终将翻译从语言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一位翻译《圣经》的译者,面对大量需要解决的复杂的翻译问题,应该首先从社会语言学这个引人入胜的角度来研究自己的翻译工

作,这决非是偶然的。而且,《圣经》也应该是能够导致翻译理论产生的一部文献,这和它在全球范围内流传的特点是完全一致的。到目前为止,《圣经》已被译成 300 多种语言,当然并非所有的译本都已刊印。即便如此,在 1815 至 1984 年间,《圣经》共出版了 27 亿多册。

尤金 A·奈达是最负盛名的美国圣经公会的顾问,他于 1943 年加入该公会并担任翻译部执行秘书。1970 至 1980 年间,他任圣经联合会翻译研究协调人职务。奈达发表的著作横跨 45 年,对他所遇到的大量翻译问题做了分析。奈达最知名的著作,无疑当推集 20 年研究成果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在这部著作中,他已经提出了翻译过程三个阶段的模式:即分析、转换和重组。他还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立的动态对等概念,从而与那些把翻译仅看作是从表层结构中寻找对应成分的比较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

因此,在奈达看来,意义重于形式。严格按形式成份来翻译必然会模糊原语文本的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即原语文本深层的社会语言学特征,从而妨碍跨文化交际。这样一来,翻译就不仅仅只是一项与语言学有关的复杂的工作了,它的目的是要把民族不同的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奈达是循着萨丕尔(*Sapir*)和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学术思想的脚印向前走的,他认为有效的交际不单单来自语言成份,因为在更广阔背景下,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完全反映同一现实,不管这种现实是物质的、社会的、生态的或是宗教的。

在奈达的研究工作中,理论始终是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早在 1969 年,在与查尔斯·塔贝(*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

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奈达就放弃了 *target language* (目的语) 的提法而采用 *receptor language* (受体语)。这就清楚地表明:在传统的“作者—译者”模式中,还应该将对译文可靠性唯一具有发言权的读者包括进来。这一论点被某些学者称之为“行为主义的观点”,但却受到了包括萨沃里(*Savory*)、马尔戈(*Margot*)、卡里(*Cary*)这样一些学者的赞同。

奈达的结论几乎都是从他处理《圣经》翻译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以系统研究 200 多种不同语言的翻译中所遇到的难题为基础的。这些结论清楚地反映了奈达对翻译过程中突出社会语言学因素重要性的潜心研究——这种做法在过去常常未能受到重视。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奈达的研究开创了翻译理论的新时代,斯坦纳(*Steiner*)称之为“是对《圣经》的经典诠释,几乎是哲理的升华”。翻译理论将不再受语言学的主宰。实际上,现代翻译理论取决于对众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神经语言学所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圣经公会工作的几十年间,奈达在审订《圣经》新译本的同时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学术研究以及人员培训。在同与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和萨丕尔(*Sapir*)齐名的一些语言学家共事后,奈达著述或与他人合著了 35 部著作,发表了 250 多篇论文,论及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语义学。因为工作的缘故,他访问过 85 个国家,使他能有机会来研究 200 多种语言和文化中语言学和翻译的方方面面。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一些最负盛名的翻译院校仍然是必读书籍。

1994 年 10 月,布鲁塞尔高等翻译学院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奈

达博士,他所做的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社会语言学的讲座拉开了1994—1995新学年的序幕。在学院逗留的一周期间,奈达博士主持了5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师生们交流了他在《圣经》翻译领域内的宝贵经验,同时也谈到了他近期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更为令人振奋的成果。奈达博士阔别比利时已经46年,这次来布鲁塞尔高等翻译学院讲学,我们深表谢意。他的到来无疑是对我院40年来教学质量的肯定。

《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是阿扎尔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它是奈达博士在布鲁塞尔高等翻译学院所做的一系列精彩讲座的结集。本书在文字上经作者亲自审定,对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劳以及他对我们的信任和友谊,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奈达博士处理翻译过程的方法,论述翔实,清晰实用,特别强调了语际交流中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无疑将受到热心于翻译事业的读者的欢迎。

克里斯蒂昂·巴利都\*

---

· 说明:

序文是用法语撰写的,英译:玛丽-简·法伦。汉译时,我们以英译文本为基础,参照了法文原文。



## 〔注释〕

①多雷(*Dolet, Etienne, 1509—1546*) 法国语言学家、古文学者和印刷商。生于法国奥尔良,早年在巴黎求学,后旅居意大利,21岁时返回法国,投身人文主义运动,多次卷入政治和学术论争之中,曾与伊拉斯谟进行过辩论。他撰写、翻译和出版了许多有关语言、历史和哲学的书籍。多雷对翻译的贡献除几本译著和论述希腊语、拉丁语的专著外,主要在于他1540年发表了一篇专论翻译理论问题的著作,题为《论如何出色地翻译》(*La maniè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en autre*)。论著篇幅不大,但它却是欧洲翻译理论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②詹森主义(*Jansenism*) 17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不能行善避恶。

③加斯帕尔·德·唐德(*Gaspard de Tende*) 生平不详。

④皮埃尔·达尼埃尔·于埃(*Pierre-Daniel Huet, 1630—1721?*) 17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多种语言,学识渊博。他既崇拜古典文学又明确提出准确译法,既批评厚今派作家圣索尔兰,又批评不忠实派翻译家德·阿兰伯库。他于1661年写了专著《论翻译》(*De Interpretatione*),采用对话形式,以朴素的语言批评了古代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的活译法,同时也猛烈抨击了当代“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家。

⑤西塞罗(*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106—43*) 古罗马著名翻译理论家、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主要见于《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 约公元前46年*)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公元前45—44年*)。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论述翻译问题的专著,但作者在书中部分章节涉及翻译问题的精辟见解,却对后